

白鳥庫吉著
王古魯譯

塞外史地論文譯集 第二輯

商務印書館發行

白鳥庫吉 著
王古魯 譯

塞外史地論文譯叢第二輯

中華教育文化基金董事會編譯委員會編輯
商務印書館發行

中華民國二十九年一月初版

G 四五三七上

鎮

◆(93262B)

塞外史地論文譯叢第二一冊

每冊實價國幣五元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原著者 白鳥庫吉

譯述者 王古魯

編輯者 中華教育文化基金會董事會編譯委員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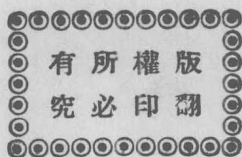
長沙南正路

發行人 王雲五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各埠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本書校對者殷師竹)

目次

【一】西域史的新研究·····	一
【二】大宛國考·····	一五七
【三】罽賓國考·····	二一七
【四】塞民族考·····	二七九
【五】粟特國考·····	三九七

塞外史地論文譯叢

西域史的新研究

原文見東洋學報第一卷（一九一三）第三號第二卷（一九一四）第一號第三卷（一九一五）第一號第二號

自從漢代司馬遷撰著史記，首闢大宛列傳以來，歷代正史，無不仿其體裁，而附西域傳於卷末。遠東學者之所以極早即能窺見遠西的事蹟，實由於此傳。然此種記事，大抵是漢土使者奉命赴彼國時親見親聞的事蹟；或彼地使臣朝貢時爲史官叩問所得的情形，所以材料零碎而不豐富，排列亦亂雜而欠聯貫，蓋亦不得已也。因此古來噲炙人口的國家或人物，尙未能追究其詳細正確的事實，至於其他事蹟，更可以推想的了。於是，漢史中的西域傳，一如空中樓閣，其縹緲變幻的狀態，對於「習於神祕」的宗教家，或者可以使得他們滿足，但是對於「要求正確事實」的歷史家，時常使得他們發生隔靴搔癢之感。自從最近二百年來泰西學者從事研究東方學問之後，其成績之顯著，實堪驚歎。他們不僅學習亞細亞各國的言語文字，通曉亞洲的史籍記錄，而且發掘廢墟，調查遺跡，發見新事實者，亦不知多少。於是，漢代所傳的西域事蹟，可以拿來和他們在別方面所得豐富的知識，互相啓發闡明者甚大。到了現在，所有西域史上的祕密，行將經他們之手，開發無餘。至於我輩遠東學者在今日，對於西域，所以能有脈絡相通的知識並能作科學的考察者，亦可以說完全是受着西洋學者熱烈真摯研究之賜。西人的研究，雖如此

熱烈；我人所受西人之賜，雖如此重大，然其間尙不無留有可以開拓的餘地。余曾草有關烏孫國及大秦國的論文，供獻學術界。其後再加研鑽，發見前說有應加變更之處；又新得見解，乃撰此西域史的新研究一題，擬另有陳述。此篇論文雖小，如能對學海有涓滴之神益，則幸甚。

【第一】康居考

方今泰西的東方學者，大都以古代“Sogdiana”一地相當漢代康居國的本土，但此種謬見，其故究不過由於他們拘泥於隋唐二書一類的後世記錄，而未曾深加考察漢代所著史記漢書的文義。試閱史記（卷二百）大宛列傳，則云：「康居在大宛西北，可二千里，行國，與月氏同俗。控弦者八九萬人，與大宛隣國，南羈事月氏，東羈事匈奴。」大宛與今日的“Fergana”州，疆域大抵相同，所以在大宛都城西北二千里的康居國，斷不能目爲“Sogdiana”一地。再閱漢書（卷九十六）西域傳康居國條，則云：「康居國王，冬治樂越匿地，到卑闐城，去長安萬二千三百里，不屬都護，至越匿地，馬行七日，至王夏所治蕃內九千一百四里，戶十二萬，口六十萬，勝兵十二萬人。東至都護治所五千五百十里，與大月氏同俗，東羈事匈奴。」據此段文字，康居民族是游牧民族，夏、冬二期，則變更居地，其生活狀態，完全與今日游牧於黠戛斯（Kïrgïz）曠野的哈薩克（Kasack）人相同。黠戛斯平原，冬季寒氣峻烈，不適於畜牧的生意，所以黠戛斯哈薩克人，一見秋風吹起，即拆穹廬，遷往南方溫暖地帶，選擇冬期較短，糧食易得之處居住，習以爲常。上述地帶，大都是河澤湖泊的沿岸，蘆荻繁茂之處，而真珠河（Syr Darya）河畔Saxaul樹木叢生之地，即是他們最喜聚合之處（Schwarz, Tufkesian. p. 82-88）。據漢書文義，康居的「樂越匿」一地，就是黠戛斯

民族冬期居住之地，也就是黠戛斯所稱的“Kialak”。又「蕃內」云云，乃是夏期的游牧地方，也就是他們所稱的“yaylak”。

如果「目康」相當今日黠戛斯哈薩克的游牧民族，而其居域亦在黠戛斯平野間」之說，正確無誤，著者將於下文之中，考究其都城卑闐城的方位。案漢書西域傳大宛國條：「大宛國治貴山城（略中），北至康居卑闐城千五百一十里，西南至大月氏六百九十里，北與康居，南與大月氏接。」依據此段文字，康居的都城卑闐城，雖似位於大宛都城貴山城之北千五百十里之處，但是如果依據史記大宛傳，則康居去大宛西北二千里。由此而言，康居與大宛兩國都城，相去似在千五百里至二千里之間，而其方向，卑闐城似在貴山城之北方或西北方。當考定卑闐城的方位之際，可作考定的唯一線索的記事，祇有從大宛貴山城方面所推定的方向與距離，因之，如果能夠確定貴山城的位置，自然也能推測卑闐城的所在了。可是關於貴山城的方位，所有東方學學者的考察，各各不同，尙未能有所確定。黎希托芬（Richthofen）氏以爲貴山城就是今日忽禪（Khodjend）西南的“Ura Tube”（即唐代的罕都利瑟那，阿剌伯人的“Ostusna”）[China. Bd. I. p. 451]。Iacouperi及勃婁德希那以逗爾二氏，主張此城相當“Namangan”西北的“Kāsān”三宅（米吉）博士對於上述二說，頗抱懷疑，而推定此城即爲今日的「忽禪」。藤田（豐八）文學士則贊同Iacouperi等氏之說，亦目此城爲“Kāsān”，而考定此城即爲唐書所載的渴塞城（慧超傳箋釋七十三葉）案今日的“Kāsān”，就是耶律楚材西遊錄所記的「可傘」，勃婁德希那以逗爾氏則比擬之爲元經世大典西北圖中所見的「柯散」，洪鈞氏則云唐書（卷一百一十一）所記拔汗那

「圖名城」「渴塞」即係「柯散」(元史譯文證補二十六上)沙畹氏則一如藤田氏考定唐書的「渴塞」就是今日的“Kasān”

(Documents sur les Tou-kiue Occidentaux. p. 278) 此城自古以來，即爲聞名於東西的都城，其名亦散見於阿剌伯的記錄。泰已利氏 (Tabari) 記載古太 (Kutaiba) 於公元七一二或七一三年略取“Šaš” “Khodjend” “Kasān” 耶蒲基氏 (Yabuki) 在“Fergana”地域中，亦舉有“Kasān”一名，此外九世紀至十世紀間的伊朋·霍開爾 (Ibn Haukal) 愛德立西 (Edrisi) 亞蒲否大 (Abulfeda) 等氏所著書中，亦莫不記載此城名字。又據十三世紀初葉的耶古氏 (Yakut) 之言，當時的“Kasān”已不復保存昔日的繁榮云。又據十五世紀末期的蘇灘巴倍爾 (Sultan Baber) 的自敘傳，記載“Fergana”都城“Akhsiket”之北，有小都會，名“Kasān” (Bretschneider. Mediaveal Researches. Vol. I. p. 52) “Fergana”國都城之隨時代而變更其治所，就是從漢史方面，亦可以證明。試案唐書 (卷二百一十一) 西域傳，則云：「寧遠者，本拔汗那，或曰鑠汗，元魏謂破洛那，去京師八千里，居西韃城。在真珠河之北，有大都六，小城百。(略中) 貞觀中，王契苾爲西突厥，瞰莫賀咄所殺，阿史那·鼠匿奪其城。鼠死，子遏波之立，契苾兄子阿丁參爲呼悶城。遏波之治渴塞城。顯慶初，遏波之遣使朝貢，高宗厚慰諭，三年，以渴塞城爲休循都督府。」依據此段文字，唐代拔汗那國最初的首都是西韃城，其後始遷至渴塞城。西韃城，就是阿剌伯人所稱的“Akhsiket” (Bretschneider, Mediaveal Researches. Vol. II. p. 53; Chavannes, Documents Sur les Tou-kiue occidentaux. p. 148) 而渴塞城一如前文所述，就是今日的“Kasān”再追溯隋書 (卷八十三) 西域傳考之，則云：「鑠汗國都葱嶺之西五百餘里，古渠搜國也。王姓昭武，字阿利柒，都城方四

里。^(中略)東去疏勒千里，西去蘇對沙那國五百里，西北去石國五百里，東北去突厥牙二千餘里。』此段文字之中，雖未舉出都城名字，然而當時的首都之爲今日的“Kasān”（即唐代的渴塞城），已可就下列二點推而知之。蓋既得此城至石國（Tashkend）及蘇對沙那國（Ura Tube）間距離的比例，又因漢人擬此城爲古代渠搜國之故也。渠搜國與折支國，同是見於中國古典中的西戎國家，實據黃河上流流域，但因漢人習癖，呼當時鐵汗國都城爲“Kasa”，“Kasān”，所以就附會此國爲古代渠搜國了。藤田文學士亦曾推測隋代鐵汗國首都爲西韃城，此說如確，即不能說明「漢人引出古渠搜國而擬爲此國」的理由了。依據上文所述，今日的“Kasān”，既是古來有名之地，所以以此城相當大宛國都貴山城亦不無理由的了。

返觀“Khodjend”城的沿革，亦可以看出其由來已久了。據托瑪顯克氏（Tomaschek），公元前四世紀，希臘人建設“Alexandria”城於此，而隣接其西南之地（即今日的“Ura Tube”），當時已有都會稱“Cyropolis”。此地在漢代，屬大宛國版圖，徵之括地志所載「率都沙那國，亦名蘇對沙那，本漢大宛國」以及唐書（卷一百一十二）西域傳所載「東曹，或曰率都沙那」，蘇對沙那，却布怛那，蘇都識匿，凡四名，居波悉山之陰，漢貳師城地也，」亦可以知道的了。貳師城，爲大宛國名所，以出產汗血馬著名，今日的“Ura Tube”，原係大宛西境，亦頗爲明瞭。而“Khodjend”一名之見於漢土史書，始於唐書西域傳石國條「南二百里所抵俱戰提，西南五百里康也。」降及耶律楚材的西遊錄，則作「苦蓋」，元經世大典西北圖中，則作「忽氈」，而“Syr”河曾經襲用此城城名，故元史寶玉傳中，作「忽章河」，劉郁西使記中，則作「忽牽河」，長春真人西遊記中，作「霍闌沒聲」（「沒聲」，義爲「河」）。

明史西域傳中，又作「火站河」（元史譯文證補二十六上）。再檢阿剌伯史家的記錄，泰巴利氏於記載公元七一二年古太巴所略取的“Fergana”的城邑之中，曾舉“Khodjend”之名，亞蒲否大氏呼之爲“Khodjenda”，蘇灘巴倍爾的自敘傳中，曾述此城由來已久（Bretschneider Mediaeval Researches, Vol. II, p. 54—55）“Khodjend”既如上述，爲自古以來的名城，所以以大宛國貴山城擬之，亦決非無理的了。

“Kasân”與“Khodjend”一如上述考證所得，固屬自古以來有名的都城，故漢代大宛國都貴山城，如就此二城考定，似較妥善。著者前草烏孫考之際，曾以爲「貴山城即係今日的“Khodjend”」其主要理由，就在於「貴山」二字的發音，與“Khodjend”相近。大月氏五翕侯中的「貴霜」之爲“Khodjend”的對音，徵之西方記錄及當時所鑄造的貨幣上文字，亦頗明顯，故漢代「貴」的發音，是“Ku”而非“Ka”，亦極確切無疑。且“Kasân”一如前段例證所示，「渴塞」「柯散」「可傘」等名，無不用“Ka”，“Kha”音的文字譯音，反之，“Khodjend”的譯音，則爲「忽章」「苦蓋」「俱戰提」「忽託」「霍闌」「火站」等文字，均用“Ku”，“Khu”，“hoa”等音。因之，余曾一度以爲漢代「貴山（Ku-san）」二字譯出的大宛都城，似非今日的“Kasân”，而係今日的“Khodjend”了。及至其後重行細讀史記大宛列傳，發見上述斷定，有矛盾的事實存在。案大宛列傳中曾有「宛王城中無井，皆汲城北流水，於是乃遣水工，徙其城下水，空以空其城」（徐廣曰：「空」一作「大」，蓋以水瀉，貽其城也，言空者，令城中渴乏）」「乃先至宛，決其水源，移之，則宛固已憂困」，「聞宛城中新得秦人，知穿井，而其肉食尙多」等條記事。據上引文字察之，貴山城傍所流河水，必係細流，而非大河。如果貴山城所臨河水，竟如流過“Khodjend”城外的“Syr”河那

條巨流，則漢朝水工怎能決其水源，移之他方，而使城外河水涸竭呢？我人之所以難於堅持「昔日所考定貴山城爲“Khodjend」之說者，完全在於此點。又據巴倍爾氏，“Kasān”城旁有小流，亦名“Kasān”，流至“Akhesy”附近，而注入於“Sihun”（“Syr”河的大食名稱）河中；又據勃婁德希那以逗爾氏“Kasān”河河水，未至“Syr”即已乾涸”（Medieval Researches, p. 52）。單就此等事實而言，亦可以知道“Kasān”河是山間的溪流，水量不多了。余因其有此等理由，故欲贊同「考定貴山城爲今日“Kasān」之說。

如果大宛都城確係今日的“Kasān”，則其北千五百十里或其西北二千里的康居國卑闐城，果應求之何地呢？藤田文學士似以魏代者舌國（即今日的“Taskend”）擬卑闐城。其所持理由，因魏書既載「者舌國爲故康居國，去代一萬五千四百五十里，又洛那國（Fergana）爲大宛國，其都貴山城，去代一萬四千四百五十里」，則者舌（即康居）去洛那（即大宛）一千里，而漢書則載大宛貴山城北至康居卑闐城千五百（一十）里，洛那至者舌國既有一千里，則漢書所載「千五百（一十）里」當係概舉其大數而言云。然一如上文所述，漢書既載大宛國都貴山城至康居國都卑闐城有一千五百一十里，史記又載康居在大宛西北可二千里，則洛那者舌兩國間距離千里云云，不僅在里數方面，已大相徑庭，而且據唐書西域傳所云，石國（即魏代的者舌國）爲康居五小王中窳匿王所領，所以考定此地爲康居王治城卑闐城一節，於理不合。如果今日的“Taskend”，並非康居的卑闐城，則此城非求之他方不可。如果依照漢書所記，卑闐城在大宛貴山城北方一千五百一十里之處，則此城理在今日的怛羅斯河（Talas）或“Öu”流域。由此而此一帶地域果曾隸屬康居王管轄與否？苟非考究當時

此一方面形勢之後，殊未能決定。黎希托芬氏以今日的“Taşkend”，“Chemkend”，“Turkestan”爲康居的游牧地帶，並推定其東北“Kara Tau”及“Alexandria”兩山脈北麓爲烏孫領域（China, Bd. 1. p. 451）。如果黎希托芬氏之說不誤，則康居王所治之卑闐城，並不在此一方面。但是烏孫國領土，是否真如其說，竟延長及上述的西方境域呢？此項問題，非首先解釋不可。

以前明白陳述烏孫及康居境界的，就是漢書陳湯傳敘述陳湯與都護甘延壽討伐郅支單于時經過路徑之處所載「即日引軍分行，別爲六校。其三校從南道，踰葱嶺徑大宛；其三校都護自將，發溫宿國，從北道，入赤谷，過烏孫，涉康居界，至闐池西。而康居抱闐將數千騎，寇赤谷城東」的一段文字。上文中所稱的「南道」，指自疏勒（即今日的“Kaşgar”）西上和色爾河（Kizil Su）流域，至“Alai”高原，自此過“Terek Daban”，而西北入“Fergana”的路徑，亦毋待論述的了。至於「北道」，則稍欠明瞭。然而就漢書所載「發溫宿國過烏孫，赤谷城至闐池西」云云考之，則此條交通路線，似與唐書（卷四十）地理志所記溫肅（即漢代的溫宿國）至怛羅斯城的路徑吻合，茲錄載其一節於下：

「一日于祝，曰溫肅。又西北三十里至粟樓烽。又四十里度拔達嶺，又五十里至頓多城，烏孫所治赤山城也。又三十里度眞珠河。又西北度乏驛嶺，五十里度雪海。又三十里至碎卜戍，傍碎卜水五十里至熱海。又四十里至凍城，又百一十里至賀獵城。又三十里至葉支城出谷，至碎葉川口八十里，至裴羅將軍城。又西二十里至碎葉城，城北有碎葉水，水北四十里有羯丹山，十姓可汗每立君長於此。自碎葉西十里至米國城，又三十里至新城，

又六十里至頓多城，又五十里至阿史不來城，又七十里至俱蘭城，又十里至稅建城，又五十里至怛羅斯城。此條路線，宜與杜氏通典（卷一百九十三）石國條所引杜環經行記文字對照觀之，故再轉錄其一節於左：

「從安西西北千餘里，有勃達嶺，嶺南是大唐界，嶺北是突厥南界，西北至葱嶺二千餘里。其水嶺南流者，盡過中國，而歸東海。嶺北流者，盡經胡境，而入北海。又北行數日度雪海，其海在山嵌空萬仞，轉墮者莫知所在。勃達嶺北行千餘里至碎葉川，其川東頭有熱河，茲地寒而不凍，故曰熱海。又有碎葉城。天寶七年北庭節度使王正見薄伐城，城壁摧毀，邑落零落。其交河公主所居止之處，建大雲寺，猶存。其川西接石國，約千餘里。川中有異姓突厥，各有兵馬數萬，城堡間雜，日尋干戈，凡是農夫，人皆擐甲冑，專相虜掠，以爲奴隸。其川西頭有城，名曰怛羅斯，石國人鎮，即天寶十年高仙芝軍敗之地。」

唐書的于祝或溫肅，即爲漢書的溫宿，相當今日新疆省的阿克蘇（Aksu）。唐書的拔達嶺一名，與經行記的勃達嶺同（Chavannes, Documents sur les Torkine Occidentaux. p. 143）。頓多城爲烏孫的赤山城，漢書作赤谷城。據漢書西域傳，稱赤谷城在溫宿之北六百十里，然據唐書所云，則僅有百二十里而已。眞珠河，其義與突厥的“Jāncū”河相同，當然是“Syr”河上源之流無疑。沙畹氏考定其爲“Ajak-tach”（Documents sur les Tou-Kine Occidentaux. p. 9）。Barthold氏則推測此河爲那林河（Naryn）支流“Kara-bai”或“Gau-gurek”（Zur geschichte des Christentum im Mitterasiens. p. 70）。關於雪海，夏德氏則以爲相當“Son-kul”（Nachworte Zur Inschrift des Tonjukuk. p. 71）。Barthold氏則擬之爲“Belkul”（p. 70）。又

沙畹氏主張「乏驛嶺」爲「Djilym-bel」(p. 9)夏德氏則以爲「碎卜水」卽係流過「Kaskar」谷的碎葉水上流。「熱海」當然不消說得就是今日的「Tsik-kul」漢名卽爲此一突厥語的對譯。Barthold 氏解釋唐書的「凍城」「賀獵城」「葉支城」「裴羅將軍城」在此湖南方；反之，沙畹氏則欲求之於此湖的北方。「碎葉」卽爲泰巴利氏所說的「Su-j-ab」，指今日的吹河 (Marquart, Die Chronologie der altturkischen Inschriften. p. 56; Hirth, Nachworte zur Inschrift des Tonjukuk. p. 73) 由「Su-j-ab」至「Talas」一帶的地名，阿剌伯人紀行之中說明者頗多，茲引用德·高琪 (De Goje) 氏依據伊朋·柯爾達倍 (Ibn Chordādbeh) 氏及可達瑪 (Kudāma) 氏所記的路徑於左：

自 Talas 下——Nušag'an = 3 parasangs

kasra —— bas = 2 parasangs

kul —— šub = 4 parasangs

Gul —— šub = 4 parasangs

kulân = 4 parasangs

Birky

(mirky) = 4 parasangs

Isbra = 4 parasangs

Nūkat = 8 parasangs

Charaṅgawān = 4 parasangs

Gul = 4 parasangs

Sârig = 7 parasangs

自此處至突厥牙 = 4 parasangs

9133 = 2 parasangs

Newâket = 2 parasangs

Baṅḡiket = 1 parasangs

Suj-âb = 2 parasangs

上——Nūbaḡan = 十五日程

(Barthold. p. 33-34)

托瑪顯克氏參照唐書地理志作左列的解釋：

(一) Tanāz 卽係位於 Aulie-atā 南方的 Talas。

(二) Kasra-bās 卽係 Aulie-atā。

(三) Kulan 卽係 Tarty 亦卽係唐書的俱蘭城。

(四) Ašbara 卽係 Asbara 城上的 Tchardawar 亦卽係唐書的阿史不來城。

(五) Nāz-kat 或卽係 Aksu 如讀成 Tūm-kat 或卽係唐書的凍城？

(六) Gul 卽係 Pispek。

(七) Sariğ 如果相當唐書的米國，則應讀爲 Marğh。

(八) Karluk 可汗的牙帳，據玄奘云，在碎葉水，Sui-ye-Sui 在 Tokmak 附近。

(九) Suj-ab 當在 Issik-kul 湖西岸。

玄奘·三藏自跋祿迦國至恒邏私城時所經路徑，既然就是此條山道，則西域記中所載「凌山」並非天山的「Muzant」嶺，實指唐書的勃達嶺，亦就是今日的「Bedel Daban」。首作此種解釋的學者，就是黎希托芬氏 (China. Bd. 1. Tafel 9.) 目前遵奉其說者頗多。然此種目「Bedel Daban」爲凌山或冰山之說，世間對之懷疑者，頗不乏其人。因之，余欲提出「Bedal Daban」卽係冰山的一件新事實，確證黎氏之說。三州輯略

(卷之七) 藝文門冰山讀曰：

「伊犁之南，渡渾河五六百里，有冰山焉。俗名八達坂，爲適葉爾羌西藏要路。其冰一日數折，亦終古莫解，高撐雲霄，下絕九地，分軫陰陽，回轉日月。過此坂者，必以子夜，人馬半道，亦輒聞天傾地裂之聲，或竟有陷入無間者。開合既倏，孰窺神奇？呼吸未周，已別人鬼。每星郵羽檄，取道於斯，雖蚊行蠅步，蛇枉魚擊，或震慄失形，回皇墮魄。然舍此以往，別無他道。若天風不鳴，月魄晃朗，陟其巔者，入輒聞百丈以下，絃管絲竹，嘈嘈並舉，聆其清絕肖子

夜，或以爲流漸沙石，上下搏擊，其幽咽吞吐，響或類斯，亦卒莫究其奇英。主宿頓者，必日撥回戶二十，鑿冰棧冰，梯以通過客。余偶隨將軍至此，既目其靈異，又莫測幽隱，爰爲之贊曰：

陰陽顯晦，倏爾萬變。飛仙失足，亦墮無間。冰梢燦日，波末閃電，清商夜聆，奇鬼晝見。危茲達坂，高乃百盤。南馳于闐，北走大宛。洶洶隆隆，地軸半折，熖熖燦燦，天宇五色。」

此文雖頗有玩弄文筆陷於誇張之嫌，但玄奘西域記（卷一）敘凌山光景云：「山谷積雪，春夏合凍。雖時消泮，尋復結冰。經途險阻，寒風慘烈。多暴龍難，凌犯行人。由此路者，不得赭衣持瓠大聲叫。微有違犯，災禍目覩。暴風奮發，飛沙雨石，遇者喪沒，難以全生。山行四百餘里至大清池。」如果以之與上文對照，亦可以想見此條山道之艱險，決非尋常可比了。烏孫國都赤谷城，去勃達嶺之北五十里，地勢既係高峻，所以以冬期居地而言，似不甚適當。以余觀之，烏孫或者亦如其他的游牧民族，冬夏異地而居的吧？由此而言，赤谷城即係其夏期的居地（即“Yaylak”）一至冬日，則必移至北方平原放牧。漢書雖明載烏孫國都爲赤谷城，但唐書則記爲赤山城。今葱嶺南部“Tashkurgan”近傍之地，稱爲色勒庫爾（Sari-kol），此係“Turk”語，義爲「黃谷」。想必昔日曾爲烏孫國都之地，在漢代土語中呼之爲“Kizil-kol”，所以漢人譯之爲赤谷的吧？西域都護甘延壽的軍隊，如果經過此城而至閼池之西，則此水之必爲唐代的熱海（即今日的“Tsisik-kul”），亦不難推想的了。此海海水，即至盛冬，亦不凍合，故Turk語中呼之爲“Tsisik-kul”（熱海）又以其帶有鹹味，故Turk語稱之爲“Tus-kul”，又以其含有鐵氣，故蒙古人稱之爲“Temurtu Nôr”（即鐵池）云。此海雖有上述種種名稱，但突厥人總稱此條大湖爲“tengis”，或“dangis”，